

《資治通鑑》與作者司馬光

我們常常會有一個想法，想回到過去，去看看那已經逝去的歲月。我們想乘坐科幻小說中的機器，穿越時光隧道，回到那幾十年前、幾百年前、甚至幾千年前，去看看當時的情景嗎。我們知道，這個機器只存在於科幻小說之中，時光隧道只不過是人們的一種幻想而已。然而，過去對於我們卻有著恆久的吸引，我們總覺得「今天」既是從「過去」演變發展而來，我們總不能對過去一無所知；反過來說，只有知道那已經消逝的過去，我們才能理解今天，也多了一點展望明天的依據。

過去已經不存在了，卻未全然消失，它留下了一些片段，一些剪影，以及一些實實在在的物件。文字是語言的記錄，也是事情的載體，只要這些事情值得記載，文字就顯現了它的功能。於是，這些所謂「史書」上的文字記載，就成為我們認識「過去」的主要憑藉了。所以，我們今天知道的「過去」，不完全是那真正發生過的事情，而是經過存留、選擇、改寫，方才記載下來的「歷史」。

每一個時代，都產生了許許多多的文字記錄，也都流傳著許許多多的事件情節，哪些要記下來，哪些可以捨棄，需要仔細斟酌；值得保留的這些，如何處理，要怎樣選取重點，要摘錄哪幾句話，用怎樣的文字陳述，也需要好好想過。歷史工作者的思慮與用心，往往決定了我們所見到的過去，將會呈現出一幅怎樣的面貌與圖像。

一、追求理想的時代

《資治通鑑》成書於北宋中期。時代的特色與氛圍，往往決定了這個時期著作的性格與氣質。那麼，北宋是一個怎樣的時代呢？中國歷史上，宋代的出現，結束了整個中古時代，開啟了嶄新的局面。新的時代，門閥世族消融了，法律上不再有良賤之分，人們基本平等；而且，富貴不傳三代，通過科舉考試，任何讀書人都機會進入社會的上層。另一方面，各種物品的生產較前增加很多，工商發達，經濟繁榮，人口增加，城市興起，處處呈現出富裕熱鬧的景象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人們的想法當然也與前代有著很大的不同，特別是在開國的一段時間之後，幾十年的和平安定，涵育出了一股新風氣，一種強調既然讀書，就要負起責任的新觀念。范仲淹在秀才時，就覺得應該負起天下的責任，所謂士當「以天下為己任」。以天下為己任不是一句新的語詞，我們在史書上經常讀到，但都是朝廷宰相等重臣說的，他們當然要負起天下國家的大任；范仲淹只是一介書生，就說應該負起天下興亡的責任，這是過去從未見過的，同一時期的讀書人，如胡瑗、石介等人的表現中，我們看到同樣的心態。一個新時代的特有氣氛，就在范仲淹的一句話中呼喚出來了，這就是錢穆在《國史大綱》中所說的「讀書人的自覺精神」。

讀書人，讀什麼書？讀聖賢的書，也就是儒家的經典。讀著讀著，穿過表面

的文字，稍稍懂得書中的義理，竟然發覺與身旁所見所聞，有著如此巨大的落差，怎麼辦呢？把我們從經典中讀到的道理，在實際事物上加以呈現，這正是讀書的目的所在，也是讀書人的責任所在。讀《易經》，了解宇宙自然、萬事萬物的基本道理；讀《春秋》，明白人群國家、政治社會的基本原則。從這裡開始，大家進一步、深一層的不斷探究，理解越來越透徹，意境越來越高明，新的概念形成了，新的學說出現了。另一方面，過去不講的「夷夏之防」，今天不能不談；過去對中央和朝廷的漠然態度，也應該予以調整，不妨打出「尊王」的旗幟，重新肯定。比起上古、三代，那個典籍中的理想世界、黃金時代，唐代真是治日少、亂日多，是不值得學習的。另外，佛教這個外來的宗教，居然長期盤據人心，成為人們立身處世的指導，真是儒者的奇恥大辱，我們一定要把這個最重要的陣地奪回來，讓聖賢的理念成為社會大眾的生活指針。

過去的世界呢？上古、三代之外，我們知道多少呢？其實不多，大家讀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，主要欣賞並學習文章中那宏偉的氣勢，美麗的辭藻；讀兩唐書，在於看看輝煌一時的大唐帝國，是怎樣衰敗的，是外患、宦官，還是女主？其它呢？所知十分有限了。在這樣的一個事事追求理想的時代氛圍中，人們不能對過去的世界有一個完整的認識，怎麼說都是有待彌補的缺陷。

二、《資治通鑑》的編寫、注釋、議論

陝西人司馬光，小時候打破水缸，救出溺水玩伴的故事，讀過書的中國人幾乎無不知曉。然而，他小時候喜歡讀歷史，知道的人就不多了。司馬光年七歲的時候，聽人家講《左傳》，很喜歡，再講給家人聽，講得很完整。年紀再大一點，捧著一部《高氏小史》讀了又讀，這部唐人的作品，不過是把《史記》到《隋書》的內容加以摘抄而已。他讀得很有興味，這些故事真是太有趣了、太感人了，另一方面也不免覺得它真是有欠完整啊，有的地方點到為止，有的地方交待不清。這時心中自然會萌生一個念頭，我長大後，要寫一部理想的歷史書，要把過去世界中這些有趣味、有價值、有意義的事情，有系統地記載下來，讓大家能夠認識到我們的過去，

司馬光二十歲參加科舉，進士及第，同榜的有王安石。他與王安石同在「群牧司」任職，長官是包拯，就是後來以「包青天」的故事，成為家喻戶曉的那一位人物。群牧司牡丹盛開，包拯擺設酒宴，與僚屬們賞花飲酒作樂。包拯走到司馬光面前，要司馬光喝酒，司馬光不喜歡喝酒，但看到長官親自勸酒，也就喝了一口。包拯到了王安石面前，王安石說：「不喝」，就一口都不喝，連包拯也拿他沒辦法。這件事給司馬光很深刻的印象，也讓我們對於北宋的這兩位大人物的個性，多了一點了解。

宋神宗是敬佩司馬光的，只是最後採納了王安石的主張，實施了全面的改革，就是歷史上著名的「熙寧變法」，也稱之為「王安石變法」。司馬光對於王安石的政治理念始終不贊成，屢次寫信給王安石表達自己的意見，當然，對於執拗的王

安石而言，都是聽不進去的。神宗既重用王安石，司馬光只有退出政壇，以編修一部歷史為志業了。

其實，編寫一部好的歷史，一直是司馬光心中的遠大理想與終極關懷。在神宗之前的英宗朝，司馬光上書皇帝，要編一部編年體的歷史，稱之為《通志》，得到英宗的支持。英宗在位四年去世，神宗繼位，司馬光提出編寫史書的需求，神宗同意支援，最初在京城開封，後來到西京洛陽，編寫的機構「書局」都跟著司馬光。司馬光從朝廷得到了編書所需財力與人力的支援，這是耗時長達十九年，終於完成的重要原因。

司馬光要寫的是編年體的史書，「編年體」這種按照時序一年接著一年寫下來的史書，可以讓讀者對歷史有一個整體的認識，效果超過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之類的紀傳體。而「編年體」的典範，就是《左傳》，《左傳》之後，雖然也有一些，如荀悅的《漢紀》，也只是一個朝代的編年史著作。所以，司馬光認為應該接續《左傳》，編寫一套上自戰國，下至五代，一年接著一年的編年體史書，讓我們看到過去的事件，宛如一幕又一幕的展現，其中有逐漸興盛的氣勢，也有衰敗下場的過程。同時讓我們看到歷史舞台上，有很多教人欽佩感動的明君賢臣、英雄豪傑；也有不少令人厭惡不齒的昏暴君臣、佞倖小人。我們從這些過去的經驗中，既可以明白事情的道理，也可以領悟人生的意義。

我們知道《通鑑》編寫的大概程序，先是把所有的資料收來，依年、月、日的次序排列，抄成「叢目」，對於資料時間的不清楚，資料內容是否可信等問題，都要加以研究、討論，做成決定，依之刪削而成「長編」。此後，選取怎樣的材料，如何加以編排，就成為編寫初稿時最為重要的工作了。我們可以想像，這個工作不是司馬光一肩挑起，而是主要助手負責，他們共同討論，做成決定，再寫成初稿。因之，長編到初稿，應是最為關鍵的工作，傑出的助手此刻發揮了重要的功用，司馬光也不會置身事外。

《通鑑》成書之後，為了方便閱讀，特別是「讀」出聲音，司馬光的門人劉安世撰寫《音義》十卷，大概由於內容貧乏，未能流傳。南宋末出現了幾種《通鑑》的注釋，大多是字音的讀法和字義的訓釋，水準都很低下。為《通鑑》這部巨著作了精細而又深刻注釋的是胡三省。胡三省生於宋朝末年，注釋《通鑑》是緣於父親胡鑰的囑咐。胡三省說，父親愛好史學，嗜讀史書，得了鼻病也不休息，弄得書上血漬斑斑。胡鑰囑咐這個十六歲的兒子為《通鑑》作注，心中明白兒子有此能力，也給了一些指示，對於已往史書的注釋，提出看法，供兒子參考。胡三省二十七歲進士及第，開始仕宦生活，也致力於《通鑑》的注釋工作。他仿照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的形式，完成了《資治通鑑廣注》九十七卷，但在元兵進入臨安，胡三省逃難時，散失殆盡。後來他又重頭做起，並且在做法上有所改動，把《通鑑考異》全部收入，和他的注釋都放在《通鑑》正文之下，可知他已不再仿照陸德明的《經典釋文》，而是有所創新，也說明胡三省注史不再接受過去的方法，而是在傳統的基礎上有所發展。

《通鑑》的衍生著作很多，但對於我們讀者來說，最值得參考的是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的《讀通鑑論》，儘管這不是一本容易念的書。這裡不對此書多作介紹，而是選兩段今天學者的閱讀故事。一是以《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》一書的作者，上古史專家徐炳昶（旭生）；另一位則是以《秦漢思想史》三冊享名的徐復觀。兩位徐先生都不是歷史系出身，但都受到《讀通鑑論》很大的啟發，讓我們看一看他們是怎麼說的：

我個人自從很幼年的時候，就對於歷史上的事實發生很濃厚的興趣。現在回想起來：我在十一二歲時就抱著兩部首尾不很完全的通鑑綱目和續綱目，廢寢忘食地閱讀，就覺得非常地可笑。但就此一點也可以證明我對於歷史的興趣，發生得相當地早。此後遇著歷史一類的書總是很高興地閱讀。當十五六歲的時候，積的知識也頗有一些，就亂七八糟的胡發議論。這時候，正當前清光緒庚子辛丑以後，國家取士初變八股為策論，我因為對於史事略有所知，雖說年幼信筆塗抹，卻也尚不後人；自己已經頗滿足，以為很了不起了。不久因為預備科舉，就偶然買到坊間印行的王船山讀通鑑論及宋論。開始閱讀的時候，僅感覺到他的篇篇的議論全同我原有的意見不相同。起初不過以為他老先生好作翻案文章而已。及至常看並加思想以後，才知道他並不是好作翻案，他的思想比我們尋常人的思想實在深遠的多；我們想再翻他的案也非常地不容易。這才開始感覺到對於古人非在讀破萬卷並加深思以後，實在不應該粗心浮氣，亂發議論！民國成立以後，我又到法國留學。當民國四年，我才讀到法儒 Langlois 和 Seignobos 合著的史業導言（*Introduction à l'étude historique*）及其他歷史方法論的書，才曉得對於史料必須要用種種的方法，慎重批評和處理才可以達到科學的歷史（*L'histoire scientifique*）的目的。在此以前，我覺得我對於歷史的事實知道的頗多；自此以後，我才感到毫無所知！因為這些全未經批評的史實，尚未足以言歷史知識也。我今日對於各家的歷史，歷史方法及歷史思想的著作雖然也讀過一些，但是對於我個人影響之大，再沒有超過於讀通鑑論，宋論，史業導言以上者，所以在這裡附帶著說一說。

我決心扣學問之門的勇氣，是啟發自熊十力先生。對中國文化，從二十年前的厭棄心理中轉變過來，因而多有一點認識，也是得自熊先生的啟示。第一次我穿軍服到北碚金剛碑勉仁書院看他時，請教應該讀什麼書。他老先生教我讀王船山的讀通鑑論；我說那早年已經讀過了；他以不高興的神氣說，「你並沒有讀懂，應當再讀。」過了些時候再去見他，說讀通鑑論已經讀完了。他問：「有點什麼心得？」於是我接二連三的說出我的許多不同意的地方。他老先生未聽完便怒聲斥罵說：「你這個東西，怎麼會讀得進書！任何書的內容，都是有好的地方，也有壞的地方。你為什麼不先看出他好的地方，卻專門去挑壞的；這樣讀書，就是讀了百部千部，你會受到書的什麼益處？讀書是要先看出他的好處，再批評他的壞處，這才像吃東西一樣，經過消化而攝取了營養。譬如讀通鑑論，某一段該是多麼有意義；又如某一段，理解是如何深刻；你記得嗎？你懂得嗎？你這樣讀書，

真太沒有出息！」這一罵，罵得我這個陸軍少將目瞪口呆。腦筋裡亂轉著；原來這位先生罵人罵得這樣兇！原來他讀書讀得這樣熟！原來讀書是要先讀出每一部書的意義！這對於我是起死回生的一罵。恐怕對於一切聰明自負，但並沒有走進學問之門的青年人、中年人、老年人，都是起死回生的一罵！近年來，我每遇見覺得沒有什麼書值得去讀的人，便知道一定是以小聰明耽誤一生的人。以後同熊先生在一起，每談到某一文化問題時，他老先生聽了我的意見以後，總是帶勸帶罵的說，「你這東西，這種浮薄的看法，難道說我不曾想到？但是……這如何說得通呢？再進一層，又可以這樣的想，……但這也說不通。經過幾個層次的分析後，所以才得出這樣的結論。」受到他老先生不斷的錘鍊，才逐漸使我從個人的浮淺中掙扎出來，也不讓自己被浮淺的風氣淹沒下去，慢慢感到精神上總要追求一個什麼。為了要追求一個什麼而打開書本子，這和漫無目標的讀書，在效果上便完全是兩樣。

取自《古代中國的圖像長卷---資治通鑑》司馬光著，張元導讀，
海豚出版社（簡體字）2012年5月。